

乡土观念与文化认同

——从徽文化谈起

吴春梅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230039)

摘 要:传统文化蕴涵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衍变之中,大一统的文化思想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地理疆域上的统一。中华文化是由各个具有显著特色的地域文化构成。明清时期的徽文化既是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又具有主流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徽文化所彰显的聚族而居的文化特征,蕴藏了浓厚的爱乡爱国的感情,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情绪。徽州宗族文化造就的礼与法的圆满结合,使儒家的价值观渗透到社会各阶层,成为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加强了民族文化的心理认同。

关键词:乡土观念;徽文化;文化认同

1902年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曾发出了这样自信而又自豪的声音:“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此后且得汇万流而济之,合一炉而治之。于戏,美哉我国!于戏,伟大哉我国民!吾当草此论之始,吾不得不三熏三沐,仰天百拜,谢其生我于此至美之国,而为此伟大国民之一分子也。”当历史由19世纪进入20世纪,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梁启超指出:“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在热情讴歌伟大中华民族的同时,梁启超也深刻指出,中华民族与其他文明古国命运的截然不同,自有其民族特质之所在,这就是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文化意蕴的博大精深。梁启超以其敏锐的眼光洞察了中华文化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探究了文化与历史的相互关联。笔者拟以徽文化为个案,从文化的角度探讨徽文化蕴藏的乡土观念及其宗法理念中体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思想所彰显的大一统思想情感。

1 徽文化的特征之一:宗族文化

纵观中国历史,中华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它对我国政治制度、法律、风俗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它对民族精神的培育,对中华民族性格的锤炼。文化意识大一统精神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以及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兼收并蓄,使其不断保持勃勃生机,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中华文化不仅形成了全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影响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中华文化是由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构成。各地域文化既受主流价值观的规范与制约,又以其地域特色而使中华文化丰富多彩。其中,明清时期高度繁荣的徽文化有一定的代表性。

徽文化(或曰徽州文化),指的是“原徽州属下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和婺源等六县所呈现的既有独特性,又有典型性,并具有学术价值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总和。它根据于本土‘小徽州’,伸展于中华大地,尤其伸展于以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州、湘州、太仓)和淮扬地区,以及芜湖、安庆、武汉、临清等城市为基地形成的所谓‘大徽州’,由大、小‘徽州’互动融合形成博大精深的文化。它包含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1] 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其宗族文化,构成了这一区域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之所以如此,与徽州传统的

收稿日期:2007-01-05

作者简介:吴春梅(1964—),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清末新政和中国近代化研究,致公党安徽省委副主委,安徽省政协常委。

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徽州宗族结构严密,且历史悠久。清人赵吉士指出:“新安各族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塚,不动一抔;千年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2]。这不仅是徽州“胜于他邑”之所在,也说明了徽州宗族组织的发达、严密与完善。

徽州宗族文化的发达与其历史传统、地理环境及朱子思想的影响、经济基础的雄厚密不可分。徽州是个高移民的社会区域,徽州移民包括两部分:一是为逃避战乱而居于此。两汉、唐末以及两宋时期的社会动荡,使中原地区的士家大族迁到徽州地区;一是在此做官卸任后居于此。中原的士家大族在迁徙之前,宗法组织严密,迁徙之后,仍聚族而居,保持原来的宗族文化风貌。徽州地区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亦使之较少受到战乱的影响,社会较为平稳。徽州是“文公阙里”,深受朱熹思想的影响,“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成为徽州人的价值追求与文化信念。朱熹的《家礼》对建祠堂、明世系、墓祭祖先等都作了详尽细致地说明和规定,它不仅使宗法制度更加系统化、伦理化,而且也推动了徽州宗族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徽商成为十大商帮之首,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及其对宗族的热爱为徽州宗族组织的发达,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历史传统、地理环境、理论阐述、经济基础促成了徽州宗族组织在明清时期的繁荣,从而使宗族意识成为徽文化的一个显著表征。

宗族文化的内涵是尊祖、敬宗、收族,族规家法将传统的伦理道德、国家的教化内化为法律,实现了礼与法的有机结合,并在这种结合中体现了家与国、忠与孝的和谐统一。明清时期徽州的族规家法基本体现了国家道德教化的原则,成为道德教化的注脚。如《茗洲吴氏家规》80条,其中一条即规定:“子孙有发达登仕籍者,须体祖宗培植之意,效力朝廷,为良臣,为忠臣,身后配享先祖之祭。有以贪墨闻者,于谱上消除其名。”^[3]按照吴氏家规,子孙若从政,忠于

朝廷即是体现了“祖宗培植之意”,在这里,“忠”即是“孝”,忠、孝不可分割。《明经胡氏谱序》则强调了“孝悌”的重要性:“孝弟之行兴于家,而一乡化之;孝弟之行兴于国,而天下化之。夫小而一家,大而一国,由家以及乡,由乡以及国,由国以及天下,而其本则在乎身也。身能体乎孝弟之实,然后能行乎其家。盖有诸中者,必形诸外,此亦自然之效矣。然所以为孝弟者,岂独在于亲亲长长而已哉?盖家之有谱,所以经世系,考宗派,使人知尊祖、敬宗之义,而欲尽孝弟之道者,诚不可以不知所重也……由是推之,其治国平天下之道莫大基于此也。”^[4]这体现了“修、齐、治、平”思想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简言之,以孝悌为基础的徽州宗族文化蕴藏着浓厚的爱家爱乡爱国的情怀,它既体现了“骨肉亲情,同族为一家”的血肉之情,又展示了“家国虽殊,忠孝则一”的高尚境界。由爱家、爱乡而爱国,“修、齐、治、平”的人生奋斗哲学体现了中华文化之根所在——饮水思源、寻根追祖、不能忘本,反映了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社会宗法性的有机统一。

2 祠堂、族谱——宗族联系的精神纽带

关于徽州宗族的特征,有学者利用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总结为八条:有共同的始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有明确的昭穆世次,开展一定的集体活动,有共同的聚居地点,有一定的管理形式,有族规家法,有一定的公共财产。^[5]就宗法制度的文化空间而言,祠堂是族众进行集体活动的重要聚居场所;就宗法制度的文化谱系看来,族谱体现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昭穆世次;一定的公共财产则是开展集体活动的经济保障。祠堂、族谱成为家族的象征和符号,成为联系族众的精神纽带。

徽州的各个宗族都非常重视祠堂的功能。《茗洲吴氏家规》第1条即规定:“立祠堂一所,以奉先世神主。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必修俗节,必荐时物,四时祭祀,其仪式并遵文公《家礼》”。第2条强调立祠

堂的目的:“祠堂所以报本”。^[6]《新安歙西溪南吴氏世谱》指出兴建祠堂的宗旨:“上以奉承祀祖宗,报本追远;下以联属亲疏,惇叙礼让”。《古歙昉溪许邦伯门修建祠祀汇存》这样记载:“族之有祠,所以序昭穆,辨长幼,上报本始,下合子姓者也”^[7]。可见,兴建祠堂,其主旨在于报本追远,怀念祖先,激发族众的宗族归属感,加强祖先崇拜观念。在徽州文化的社会语境中,祠堂已成为联系宗族子弟的精神纽带,成为同宗同族的象征符号。

修建祠堂、举办祭祀活动,有利于加强宗族子孙感情。同时,祠堂又是家族执法的场所,“徽州宗族都有族规家法,族众触犯族规家法,族长即将其唤至或执至祠堂惩处。”^[8]族规家法虽然只是民间规范,却具有刚性约束力,族长有权根据族规宗法对触犯者进行惩处,维护族规家法的权威和神圣,以维护宗法统治的合法性。这样,教化与惩处相结合,有效地强化了宗族制度。

族谱是追本溯源、明确昭穆世次的有效载体,徽州人对此非常重视,甚至将之与国家的历史相对照:“族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史以纪一代之始经,谱以叙一姓之源流,其体一也。始终备而是非有焉,源流具而亲疏别焉,其用同也。是故国无史则千载之下无公论,族无谱则百世之后无定伦。无公论而公理之在于人心者,犹不可泯也;无定伦则礼教不兴,人心螭,而风俗日偷,其弊有不可胜言者矣。甚哉,谱之不可不作也。”徽州人对纂修族谱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徽州纂修族谱的历史源远流长,到明代中期达到高潮。据赵华富先生调查,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部“收藏徽州善本族谱共200多部,是收藏徽州善本族谱最多的一个单位。这200多部族谱当中,宋元时期和明前期(洪武至弘治年间——公元1368—1505年)的族谱占10%,明中期(正德至万历——公元1506—1619年)的族谱占50%,明后期(泰昌至崇祯——公元1620—1644年)的族谱占10%,清代前期(顺治至嘉庆——公元1644—1820年)的族谱占10%,明修具体年代不详占20%”。^[9]赵先生通过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国家图书馆馆藏族谱中,徽州

族谱占有一半之多,这反映了徽州宗族制度的强大。另一方面,明代中期出现的纂修高潮与这时期徽商的崛起密不可分。修谱须以相应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徽商积累的财富在推动修谱高潮出现的同时,也进一步巩固、强化了宗族统治,而宗族统治的强化又为徽商的扩张提供了组织保障,形成良性互动。

修谱的主旨在于奠世系,序昭穆,不仅明确尊卑长幼,而且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道贯穿修谱始终。明代嘉靖年间礼部尚书姜定对“宗法”与“国法”的关系则有这样的评述:“宗法之行,永赖国法”。从徽州宗族文化看,在秉承“国法”精神基础上制订的“宗法”有助于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入人心与弘扬光大。另一方面,其对祖先的追寻也强化了寻根意识与文化认同。笔者在歙县曾看到一本潘氏族谱,其记载的世系不仅十分明确,更重要的是,它追溯到的始祖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轩辕皇帝。中华一家,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在这部族谱的世系中得到充分反映。而在徽州族谱中,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样的追寻当然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徽州的宗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根——大一统思想的一个重要源泉。

3 徽文化的乡土情结

中华文化以家庭为单位,重孝道,又有崇古的价值取向与重家庭、崇拜祖先、寻根追祖的民族感情,形成了一种文化情绪。这种文化情绪在以宗族制度为特征的徽文化中得到充分体现。徽州聚族而居的文化特征,不仅增强了宗族子弟的凝聚力,而且其对和睦邻里的强调,由血缘而地缘,逐渐形成了浓厚的乡土观念。乡音、乡情、乡愁成为一根始终无法剪断的脐带。血浓于水及落叶归根的文化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为联系全世界华人华侨的精神纽带。

徽文化虽是地域文化,但程朱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及朱熹,祖籍均在徽州(今黄山市屯溪区篁墩)。徽州历史上又因新安江得名新安郡,故程朱理学放在徽学的文化语境中名曰新安理学。南宋末

年,为了纪念朱熹,传承理学,当地士绅在朱熹故里徽州建立紫阳书院。明清时期,徽商不仅致力于徽州本土的文教事业,还纷纷在侨寓之地创办书院,以为相从旅邸的子孙就学成名计,而汉口紫阳书院则是其中的典型,其是我国传统社会后期商业经济发展和徽商“贾而好儒”的产物。^[10]明清的徽商“贾而好儒”,新安理学恢复宋代理学的荣耀,在全国有主流文化的地位和影响。“从朱熹到戴震,从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既是宋代以后徽州思想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同时也代表了该时期中国儒家思想发展演变的主流。徽州宗族最为典型,世家大族远肇汉唐,其风最为近古,而胜于他邑,实为宗族制度传承的标本”。^[11]徽州宗族文化的发达,实现了礼与法的圆满结合,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奋斗哲学开始渗入到社会各阶层,儒家的价值观被散落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徽商后裔广泛接受,成为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标准。历史早已久远,而历史留下的文化沉淀是全球华人寻根意识与文化认同的思想基础。歙县棠樾牌坊群的忠、孝、节、义牌坊是徽州文化在地理区域上的表征,不仅反映了明清时期徽州人的价值追求,更是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在这一地区的生动体现。统治者的提倡和导向,其目的虽然是为专制统治服务,但客观上却有利于加强民族文化的心理认同,有助于中华民族形成共同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大一统思想的代代相传,使统一意识成为中华民族超越时空的精神追求。“其效应是,统一被认为是合理的、正常的,分裂被认为是违规的、反常的。”^[12]这是中华文化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特质之所在,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与不竭源泉。这也正是我们研究传统文化,挖掘其精华之意义所在。

参 考 文 献

- [1] 安徽省徽学会编. 徽学丛刊(第2期),4.
- [2] 朱万曙,胡益民主编. 新安名族志. 黄山书社,2004. 1.
- [3] 朱万曙,胡益民主编. 茗洲吴氏家规. 黄山书社,2006. 21.
- [4] 赵华富. 两驿集. 黄山书社,1999. 414.
- [5] 赵华富. 两驿集. 黄山书社,1999. 217—232.
- [6] 朱万曙,胡益民主编. 茗洲吴氏家典. 黄山书社,2006. 17.
- [7] 赵华富. 两驿集. 黄山书社,1999. 409.
- [8] 赵华富. 两驿集. 黄山书社,1999. 411.
- [9] 赵华富. 西驿集. 黄山书社,1999. 411—413.
- [10] 李琳琦. 徽商与清代汉口紫阳书院——清代商人书院的个案研究. 清史研究,2002,2.
- [11] 栾成显. 徽州文化的魅力. 光明日报,2006—02—04.
- [12] 冯天瑜,杨华. 中国文化发展轨迹.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11.